

徐伟 著

民国初年

的

意义危机与思想家的应对



团结出版社

民国初年

徐伟 著

的
意义危机与思想家的应对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国初年的意义危机与思想家的应对 / 徐伟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26-3874-7

I. ①民… II. ①徐… III. ①中华文化—文化发展—
研究—民国 IV. ①K258.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0803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京鲁数码快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3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3874-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摘要

东西方两种文明在近代中国发生的碰撞、融合，是伴随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进程而发生的。现代性具有人文化、理性化、世俗化等特征，冲击和解构了传统的意义世界，导致“价值失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意义危机，其深刻性在于，它是旧秩序的危机伴随着现代性的危机，应对意义危机的路径，也都内在地包含着其自身的困境。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路径上去探寻重建价值体系、维系意义世界的方式，本文选取了三位学贯中西、努力打通中西价值观界限的思想家为研究对象，探讨民国初年思想家对意义危机的应对。

严复晚年的思想，体现出审慎、客观、渐进、包容的理性精神，展现了兼贯中西的学理素养，具有超越时代的视野以及不为时代狂潮所裹挟的冷静。一方面，他出于对当时激进狂飙的求“新”的进化思潮的忧虑，以及对世人盲目崇拜西学的警惕，着力于对西学迷信的破除；另一方面，他重倡中国传统价值，包括对孔教的梳理，对宋儒和阳明心学的评价，以及对道、佛、墨等其他诸派学说的重新发掘。对神秘、迷信、灵修这类处于人类理性范畴之外的“不可知”之物，也体现出积极和包容的心态。严复晚年对“意义”问题的思考，既体现了时代关怀，也展现了超越性。

作为思想家而非政治领袖的陈独秀，始终未曾放弃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出于对现代性世俗化、去神圣化特征的认知，他致力于寻求“非宗教的信仰心”，将人生意义定位“自我扩大”的“大我主义”，而符合其理想中“大我”的概念则是“国家”和“阶级”，虽然这两个概念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但他一直未能解决“‘大我’如何避免走向威权主义”的理论难题，新文化运动初期追求的个人自由等普世价值，在对“大我”的追求过程中逐渐消失，最终，个体价值让位于宏大的集体概念。





胡适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最著名的主张是“科学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是胡适以西方的科学方法为工具，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整合和发展，它借鉴了西方的思想学说，也借鉴了中国传统中反理学的思想资源。胡适的研究有一种“以述为作”的特征，即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诠释，来建立本身的思想体系，他所研究的反理学思想家如李觏、颜元、李塨、费经虞、费密、戴震等，都充实和印证了胡适本人的思想。反理学思想契合了现代性世俗化、大众化的浪潮，也契合了科学化和实证主义的思想路径。胡适重新诠释传统的思想工作，体现了其力图贯通中西文化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努力。

关键词：民国初年，意义危机，超越性，严复，陈独秀，胡适

Abstract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of East and West occurred in modern China, is accompanied by the global modernity process. Modernity with features of humanism, rational, secular, etc., impacted and de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the world, leading to “value anomie”. The profound derives from the meaning of crisis occurred in the early Republic, is that a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s accompanied by a crisis of modernity, meaning the path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is also inherently includes its own difficulties. Many thinkers seek ways of reconstructing value system and maintaining the sense of the world from different paths.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thinkers as objects of studying, wh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learning and make efforts to open up the boundaries of valu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and explores response measures of the early Republican thinkers dealing with the crisis of meaning.

Yan Fu’s thought in his later years, reflected the cautious, objective, progressive, tolerant and rational spirit, and displayed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etical and literacy, as well as having a vision beyond the era of the times is not coerce calm the frenzy. On the one hand, he was out of the boom, the demand-radical “new” evolutionary trend worries, as well as to the world blindly worship Western vigilance, focused on get rid of the Western supersti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re-initiate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including the Confucian combing Song Confucian and Yangming for evaluation and rediscovered on Taoism, Buddhism, ink and other doctrine. Mysterious, superstitious, spiritual kind is “agnostic” things outside the scope of human reason, but also reflected a positive





and inclusive attitude. Yan Fu's reflections on "meaning", not only embodied the era of care,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e transcendent.

As a thinker rather than a political leader, Chen Duxiu never give up and always explore the meaning of life. Out of secular modernity, to the sacred features of cognition, he is committed to seeking "non-religious belief in the heart." He positioned the meaning of life as "self-expanding" the "Big I doctrine". And in line with its ideals, "Big I" is the concept of "state" and "class". But he has been unable to resolve " 'Big I' how to avoid toward authoritarianism" theory problem.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the early pursuit of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personal freedom, was disappeared in this process. Eventually, the individual value so that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located ambitious.

When Hu Shi reviewed the argument between science and outlook on life, he said the argument is "the resurgence of Neo Confucianism and anti Neo Confucianism". Hu Shi's "Scientific Outlook on Life" had its Inherent logic system. It i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western scientific methods. It Learned from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thoughts and theories include the anti Neo Confucianism. Some famous anti neo-confucians such as Li Gou, Yan Yuan, Li Gong, Fei Jing-yu, Fei Mi, Dai Zhen, all enriched Hu Shi's thought. Anti Neo Confucianism fit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Modernity, and the ideological path of scientific and positivist. Hu Shi's work on re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 reflects his Strive of fusing the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of China and the West.

Keywords: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risis of meaning, transcendence, Yan Fu, Chen Duxiu, Hu Shi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 1

- 1.1 研究意义 / 1
- 1.2 文章体例结构的选择 / 11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
- 1.4 项目创新之处与难点 / 16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17

第二章

严复晚年对意义世界的探寻 / 19

- 2.1 何为严复晚年的终极关怀? / 20
- 2.2 清理西学流弊的“正本清源”工作 / 25
- 2.3 对儒家学说的尊崇 / 34
- 2.4 严复对道家思想的新诠释 / 39
- 2.5 对神秘主义(宗教、灵修等)的态度 / 48

第三章

从陈独秀的“大我主义”看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及思想困境 / 53

- 3.1 如何看待陈独秀思想的激进、偏颇与自相矛盾之处 / 54





3.2 “自我扩大”与“无我同一”的“大我主义” / 57

3.3 小结 / 60

第四章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与反理学思想 / 61

4.1 “以科学方法重建人生哲学”的时代命题 / 61

4.2 “理欲一元”为基础的人性论 / 68

4.3 个人独立与个体能力的培养 / 77

4.4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84

4.5 结语 / 94

第五章

结语：在“世俗中寻求超越”的路径与困境 / 97

5.1 意义危机与超越性 / 97

5.2 应对意义危机的路径与困境 / 99

5.3 小结 / 104

参考文献 / 107

后记 / 128

第一章

总论

1.1 研究意义

1.1.1 为什么选择“民国初年”为研究视域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转型期，时局风云变幻，思想领域也经历着各种激烈的冲突、碰撞、交汇和融合。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形成了若干基本的研究范式，如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反应范式、进化论范式等，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基本概念范畴，如革命—改良、传统—现代、激进—保守、西方—东方等。本文侧重于从意义和价值的角度去对这个时期进行观察和解读，系统性地研究“意义危机”的表现与应对，“意义世界”的失范与重建；尝试提出一种相对而言有一定新意的诠释典范。正如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传统的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几种范式如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等都已显示出了其局限性，本项研究，即力图进行一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尝试。

这次尝试，选择了从 1912 年民国成立到五四运动之后的十余年的一个时间段去进行思想史的观察。以 1912 年始，是因为帝制崩溃、民国创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所谓意义，必然内在包含一些超越性的、先验的、非历史的追求。寻求世俗性的秩序固然能带来意义，但这意义无法提供一个持续的支撑动力。虽然很多仁人志士长期以来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作为一种





意义性追求，但皇帝下台、民国建立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制度在现实中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内心的设想与渴望。于是当时更多的人追求的不单单是一个“民国”的形式，而是“消灭剥削和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终极制度，带有乌托邦性质；追求的是人的最终的自我解放与价值实现。所以，意义包含着秩序性的问题，但更多的是道德、信仰的问题。一个秩序上井井有条、所有人可以获得感官快乐的世界，并不能满足人类对意义的需要，这是诸多西方思想家都曾经提出过的深刻命题。更何况在近代中国，“秩序”与“意义”两个危机是并存的，“救国”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救心”之路。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经历了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界重建意义世界的探索似乎寻求到了一种出路，如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新文化运动总结性的意义，玄学派新儒家、科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均提出了各自的意义重建方案。但“意义危机”实际上仍深刻地潜藏在许多问题当中，新的价值体系其实始终没有建立起来，高调意识形态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执行了部分的意义维系功能，但随着政权的确立、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意义失落的深刻影响更进一步地被凸显出来。这十余年间，皇帝不复存在让很多人心存迷惘，民国的建立也并未能真正实现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那个平等自由的大同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民主国家永久和平”的神话破灭，也击溃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西方的推崇和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引进和传播，迅速吸引了各个阶层的关注，但仍有有识之士对这一新学说可能的不确定性保持着警醒。保皇与立宪，激进与保守，学习英美还是师从苏俄，都可以被纳入到“应对意义危机”这样的框架下来进行考察。中国的思想家们为应对意义危机，承受了巨大的心灵煎熬，付出了极为辛苦的努力，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探索，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留下的精神遗产之丰富，是前后各个阶段都无法比拟的。晚清启蒙先驱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不以中西为沟壑，而是古今兼学、中西会通，思想深邃而有前瞻性，他们对西学虽有误读，但很多是创造性的误读，远非之后许多教条主义的西化论者所能比肩；“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有非常丰富的心灵世界，如胡适、陈独秀、李大

钊，既有理性的冷峻，也有浪漫的激情；杜亚泉、张君勱、梁漱溟等保守派思想家力挽时代狂飙的浪潮，对东西文化都提出了冷静理性的分析，留下了独到的见解。当然，这个时间段只是一个管窥的窗口，读史鉴今，对民国初期的考察，其实对解释和解决今天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价值失落等问题，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1.2 如何理解“意义危机”

人类不只是物质性的存在，还是精神性的存在，人除了生存、财富、地位、名誉这些实质性追求之外，还必须要有对意义的追求。意义，应是指一系列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的综合。它追问的是“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人为什么而活？人怎样生存于这个世界？”之类的问题。“意义”这一概念，本身必然内在地包含着超越性追求。

如何确定评价意义的标准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高瑞泉认为“经过百余年来的价值变迁，意义世界似乎相当模糊，甚至有些渺茫……当代人似乎容易倾向于相对主义的观点”，这样的相对主义导致他主张“肯定自由是价值判断的公设”^①。而本文则不赞同预设公理性价值的观点。意义应是有不同层次、不同指向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意义需求。吴宓在1922年总结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曾将“人之立身存心行事”的价值分为三类：宗教为本的“天界”、以道德为本的“人界”和世俗化的“物界”。^②张灏认为“意义危机”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即原先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准则已经失范，而新的道德律令犹未完全建立起来；第二是“存在迷失”，即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已被认为不合时宜，那么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据又系于何方；第三是“形上迷失”，西方科学睿智成功地揭示了“形下”世界的因果必然性，然而世界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已无从追问。^③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意义”应分为四层关系、四重境界：

①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28页。

②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学衡》，1922年1月。

③ 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与自然的关系，在物质生活中寻求到意义，即“力”的境界；与他者的关系，在国家、民族、社会、宗族、家庭等当中寻求到意义，即“德”的境界；与超越的、神秘的终极存在的关系，在宗教、民间信仰中寻求到意义，即“神”的境界；与内在的灵性自我的关系，在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寻求到意义，即“心”的境界。四个层次逐层递进，物质性要求依次削弱，精神性的要求依次提升。相对应的，普通的世俗民众往往停留在相对低的意义层次上，而追求较高层次的意义是少数思想精英的天性与使命。民国初年的意义危机的广泛性，就表现在其在所有层面上都发生着危机。而意义危机的深刻性则在于，它并不仅仅是旧秩序解体所带来的危机，而是旧秩序的危机伴随着现代性的危机，为克服旧秩序解体所提出的方案，往往本身便是新的意义危机的开端，比如线性进化论、物质救赎论、科技万能论等，都在短时间内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但在更长的时段内加剧了世俗化，导致了人类更进一步的迷失。这种内在悖论的深刻性，也正是许多思想家挣扎、彷徨、迷茫、困惑以及自相矛盾的原因。

本人的博士论文《超越与救赎：神秘主义精神气质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进行了一种理论建构的努力，尝试解释近代思想中超越性缺失的现象。该文认为广义的“神秘主义”最核心的两重意蕴就是“超越性”与“救赎性”，在这样的界定中，“神秘主义”并不与科学、人文、理性等相对立，甚至内在包含着这些概念。这个意义上的神秘主义亦可谓是一种广义的人文主义，对未知的终极存在的探索、追问和思考，其实是为了让人类在秩序与意义双重架构的世界中更好地生存。神秘主义自身分化出“王权秩序”“教权秩序”和“心灵秩序”三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矛盾的传统，不断形成自我否定和扬弃、以实现自我推进的力量，并保持制度更新的活力。如果将神秘主义视为一个运动的理念，世间的三种秩序体系都可以成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王权作为世俗秩序的权威，教权作为抗衡和制约王权的组织化力量，而个体心灵秩序又对两种组织化权威可能出现的僵化和异化进行消解。正因为神秘主义是与“神”相联结，超越人有限的认知和行动能力，并对人的渺小和可堕失性有着深刻的体验和焦虑，所以神秘主义自身具备着一种流动性，有着反对僵化和独断的功能。西方的神秘主义在三种力量上发展都比较充分，形成保

持自我更新活力的二元政治传统；而中国的神秘主义在后两者上发展不足，形成了王权相对强大而僵化的一元政治传统。由于在古代中国过早地出现了工具理性化与世俗人文化的特征，神秘主义还没有经历自我的发展和完善，其进程就被打断。在天—德—道—圣的路径中，圣未成为制衡王的力量，而最终为王所占有。在周代末期到汉代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中，外在超越不存在，内在超越的路径不仅没能提升心灵，反而泯灭了个体性，救赎性气质被所谓的“向善”追求所淡化。这几重因素使得神秘主义单单沿着巩固王权的一个方向行进，而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也都未能有助于教权秩序和心灵秩序的形成。

在这种理论框架中去观察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方思想的冲突、碰撞和融合中，神秘主义提供了可以使两者通约的丰厚思想资源。近代所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努力学习和了解西方思想的著名知识分子，及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思潮，都与东西方神秘主义资源有着潜在且深入的关联。虽然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政治和社会思潮是近代理性化以后的产物，但其在中国的坎坷遭遇，正是东西方神秘主义秩序的差异所导致的。王权秩序的强大以及教权秩序和心灵秩序的缺乏，使得自由主义的一些主要主张如重视个人权利、视国家为工具、强烈地不信任政府等观念在中国得不到接受和支持，也使得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演化为深刻的悖论，如普世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会自相矛盾地阶段性地演化成国家主义或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梳理西方传统的基础上恰恰又契合了东方传统，如其理论的整全性以及对现世乌托邦的追求，超越性气质与救赎性气质都满足了当时中国的需要，这是其在中国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两种传统深刻而巨大的思想根源上的差异又导致其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变异。

作为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论文，《超越与救赎：神秘主义精神气质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一文显现出“有论无史”的弊端。博士后报告试图在思想性上对博士论文加以深入和拓展，也力图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去进入这项思想史的研究，做到史论结合，使研究更为扎实。本篇报告对“意义危机”产生原因的一个核心立论就是：意义危机是现代性“祛魅”的世俗化浪潮叠





加在中国“王权支配社会”的一元结构上的结果。现代性所推动的世俗化，消解了既有的权威和秩序，消解了“高贵”与“神圣”，世俗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人民大众的权利和地位被突出强调。传统中国既缺乏超越性，大小传统之间又存在断裂，当其再遭遇世俗化的浪潮时，便出现了“浪叠浪”的效果，产生了急剧世俗化。在这种急骤且剧烈的世俗化中寻求超越性，成为思想精英们的艰难使命。意义要求超越性，而现代性和中国传统一元结构都是消解超越性的，两者共同作用导致民国初年的意义危机是深刻的，遭遇的困难是空前的，造成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在时间轴上，同时遭遇着传统的意义危机与现代的意义危机；在空间轴上，同时遭遇着中国的意义危机与西方的意义危机；更为关键的是，意义危机同时发生于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层面和大众文化的小传统层面，而大小传统的断裂使得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解决意义危机更加困难。

民国初年的思想家的论著中，在谈及意义、价值问题时，很多都存在着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有些是论述中即存在着逻辑矛盾，如陈独秀时而将儒教当作一个文化整体，绑定在专制统治上，时而又承认儒教中存在着诸多可分离出来的、可与现代社会融合的道德价值；有些是同时拥护相互矛盾的价值，如康有为同时主张强力政治的观念和平等正义的观念；有些是努力地调和不同的价值但实际上并不成功，如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和《不朽》所主张的将个人融入群体的“大我主义”，胡适努力地试图调和个人与群体的价值，但实际上并无法消除两者存在着的深刻的紧张；有些是在不同时期拥护不同价值，如李大钊由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种普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思想变化之剧烈；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思想自身内在所包含的深刻矛盾性。本文力图揭示思想自身内在的困境，这样的角度，对深刻理解“民国初年的意义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1.1.3 如何理解“思想家的应对”

中国大小传统断裂的格局，是理解民初意义危机的一个关键层面，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说其关键，是因为在现代性的推动之下，“民权”

被突出地彰显出来，成为时代强音，由于民权观念的普及，“人民大众”被抛到了历史的前台。而民众包括德、智等方面的能力却无法得到精英的信任，思想精英们对“‘庸众’如何当家做主”产生了怀疑。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中国有一个名义上的民权政府，但对于思想家而言，关于“民权”，始终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核心问题值得焦虑，就是如何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包括“新民德”和“开民智”。中国的民权政府仅仅是移植了西方民主政府的形式，但既处动荡乱世，又缺少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若不奠定深厚的民众基础，民主这一形式必然是脆弱的、行之不远的。梁启超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时即指出，“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①这种“全人格的觉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动因，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国民性格的重塑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课题。

而无论是“新民德”还是“开民智”，都内在包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谁来在这个“新民德”“开民智”的过程中扮演先知和教育者的角色；要新怎样的“民德”，开怎样的“民智”；以及最关键的“如何做”。

如前所述，普通民众与思想精英对“意义”的理解和要求都是不同的，由此牵涉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问题。一般而言，“小传统（低次元传统）”指由大众文化保持的传统，“大传统（高次元传统）”是由精英文化保持的传统。小传统有两个特性：第一，它的精神意味比较少，而是多半表现在具体事项当中；第二，它是被动的，即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因为是具体而又缺少自觉，所以它是静态的存在，富于保守性。因此，小传统缺乏自我改进的能力。而大传统则是通过具体的事象，发现隐藏在它们后面的原始精神和原始目的。它常是由某一文化、某一民族当中的宗教创教者、圣人、大艺术家、大思想家等创造出来的，它的特性是：一、是精神性、意义性、价值性、理想性的存在；二、不是目可见、耳可闻，而是需要通过反省、自觉，才能再发现的；三、由这种再发现，会给予小传统以批判，一般的批判，会局限于

①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4页。





当前的时代；而高层次的批判，则会综合着时代与历史和未来，带有对传统自身的超越性；四、是动态的，是在不断形成之中，是继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的。

大传统和小传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小传统是无意识的、保守的，是以社会性为主的；大传统自身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精英形成和重塑，并不断地复归和影响小传统。大传统以其超越性的气质，表现出对未知的终极存在的探索，演化为三种权力体系来主导和影响小传统：即王权、教权、学权。

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一种奇怪的分裂之中，这种分裂不是指两者没有互动，而是指形成了“王权支配社会”的一元格局，而教权和学权都未能自成体系。^①政治上，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系统来对民众执行宣传和教化的功能，以形成一种有利于专制统治的稳定格局。在底层的乡民社会领域，有与政治系统相配合的宗法礼教体系。但是，真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则缺乏与民众顺畅沟通的途径。王权主导的、以固化既有统治秩序为主要目的的教化系统可以深入民众，而知识精英群体的精神性气质与超越性追求却不能有效地对普通民众产生引导作用。这种格局呈现出的面貌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在价值观领域常常处于对立状态，在精英层面提倡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在民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小农意味浓厚、有家无国、唯一己之眼前利益的“私”。精英层面追求“成圣”的道德主义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而民间社会奉行的则是“发财”“享福”的实用主义伦理。儒家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君子之国”，而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儒学礼教则不一定全部适用。在论及传统社会的意义系统时，学者们往往提到“天人合一”，认为中国传统价值意义系统以自然经济、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一套有机联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中国人理解生命和世界终极意义的观念框架，中国人在这一价值意义系统中得到生命活动的价值意义和心灵的归属，获得对生命和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及安身立命的力量。其实这样的论说只是精

^① 关于“王权支配社会”观点的论述，参见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自序第4页。